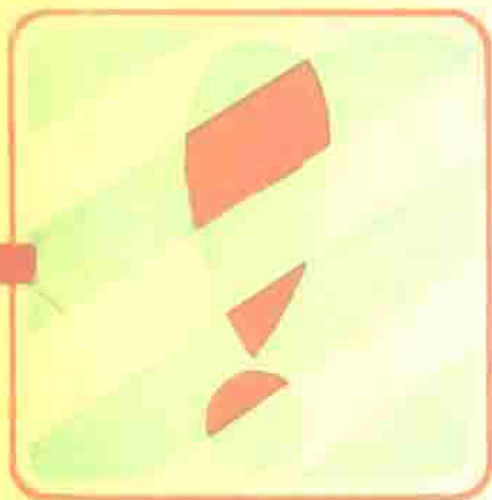


警鐘

新华社国内部政治组编

· J I N G · Z H O N G ·



山西人民出版社

聲鐘

新华社国内部政治组编

山西人民出版社

警 钟

新华社国内部政治组编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石家庄太行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25 字数: 212千字

1985年9月第1版 1985年9月河北第1次印刷

印数: 1—41,100册

书号: 3088·427 定价: 1.20元

编者说明

《警钟》告诉人们什么呢？它通过对一批典型案件的剖析，使人深思：形形色色的犯罪分子是怎样走向深渊的，一些机关企业的漏洞是怎样给罪犯以可乘之机的，不正之风是怎样保护犯罪的，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我们应该保持怎样的警惕性。

本书收集的文章，侧重于对案情的分析，对犯罪分子贪婪、凶狠本质的揭露，使善良的人们擦亮眼睛，辨别形形色色的犯罪活动和犯罪分子。在社会主义法制日益健全的今天，我们希望读者能从这些文章中受到教益。

本书共收入四十二篇文章，我们对有的文章作了点删改。中央政法委员会副书记兼秘书长、公安部部长刘复之同志为本书题写了书名，在此谨向文章作者和刘复之同志致以谢意。

一九八五年五月

目 录

浅水里是怎样出现“巨鳄”的·····	黄越 张才龙 (1)
黄金梦的破灭·····	金凤 陈谦 (5)
一桩触目惊心的贪污案·····	桂金 石克勤 (15)
漏洞在哪里? ·····	李音 (27)
王仲是怎样堕落成为死刑犯的? …《南方日报》记者	(33)
王守信为何有大神通? ·····	姜照远 艾丰 品端 (40)
盗金者落网记·····	邹爱国 (49)
“烟老虎”的末日·····	王茂修 王恩荣 (54)
“馋鱼”上钩记·····	郝永年 (63)
“支油办”变成了“刮油办” ·····	王庚南 孙景章 (66)
从追求吃喝开始·····	于行前 黄智敏 (71)
重重阻力何处来·····	晓霞 成山 (74)
“绿灯”下, 他吞噬了一个供销社·····	张书政 (79)
文物蛀虫·····	陈玉和 (84)
“画霸”的由来·····	吴克强 (89)
谁给他们以可乘之机·····	(92)
盗窃犯的自白·····	(95)
骗局与教训·····	曲建崇 黄智敏 (101)
在“大方”的背后·····	易渡 苏若冰 (110)
“胡子”案件·····	黄昌禄 (114)

关系网下护不住害人虫.....	张国栋(119)
泛起的沉渣.....	雷仲予 袁慕尧(125)
震撼河北省城的一场斗争.....	卢鹰(131)
“汽车大王”的覆灭.....	马鹤青 黄少良(140)
“总把头”和他的“保护伞”.....	(146)
“神仙”骗局的内幕.....	张伟 廖明桂 刘政(151)
诈骗老手的下场.....	关健 丘富盛 林天成(159)
骗子与财迷.....	蒋德(163)
“导演女儿”行骗记.....	龚萱(170)
一个县委书记的堕落.....	彭启炎 韩继友(175)
钱迷心窍.....	邝建国(180)
“花花太岁”逃不脱人民法网.....	李珽基等(185)
披着“演员”外衣的丑类.....	郑笑枫(192)
从新星到罪犯.....	富强 谭力(198)
阳光下的阴影.....	池茂花(204)
溺爱的苦果.....	曹光晖 刘春贤(212)
出学院进法院.....	邢法宽(219)
“七二七一”案件始末.....	陈颂(223)
“金刚方案”的破产.....	邹爱国(230)
来自“天堂”的挽歌.....	杨泉福 王燕生(238)
“黄粱梦”.....	何建军(252)
“击毙“二王”纪实.....	宋培基 王毅(257)

浅水里是怎样出现“巨鳄”的？

黄 越 张才龙

浅水，是广东省吴川县一个偏僻的小镇，中国农业银行广东省分行吴川县支行浅水营业所就设在这里。这个营业所只是一间十多平方米的斗室，工作人员只有六名，业务范围不过十多个生产大队，每天的现金收付量不过一、二万元。然而，在这样一个单位里却出现了一个大量盗用银行资金从中贪污六十万零五千多元的大贪污犯——会计李竞芳。浅水里怎样会出现“巨鳄”，这是值得深思的。

李竞芳一九五一年参加银行工作，长期在基层营业所担任会计等职务。三十年来，他满脑子的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经常考虑用什么手段不劳而获。一九七八年，李竞芳在化州县家乡建了一幢一百五十多平方米的二层楼房，为此他欠了一批债，无法偿还。这年十二月二十日，他冒用浅水公社玻璃厂的名义，向营业所贷款五百元，并把这些钱用转帐的办法转入他儿子李玉华在浅水信用社的私人存款帐户。他首次作案没有被发现，十个月后，又先后三次冒用这个玻璃厂的名义向营业所贷款一千四百元。他用这些钱支付了建房等方面的费用，并挥霍了一部分。

这几次贪污活动得逞后，李竞芳自以为手法高明，胆子更大了。一九八〇年三月至七月，他连续三次伪造一些单位

向浅水营业所汇入款项的单据，然后从银行盗用资金一万一千元。李竞芳用这些贪污得来的脏款指使他的儿子李玉华等人，从广州的投机倒把分子手中购买粮票四万八千多斤，四次前往海南岛非法出售，共牟利一千三百多元。

李竞芳从倒卖粮票获利中发现，利用从银行贪污盗用的钱搞投机生意，是一条发财的捷径。于是，他与公社干部吴锦禄、公社企业职工李瑞泉、李木生等经过一番策划，成立了一个私人合股经营的“浅水公社货栈”。李竞芳对同伙说：“资金由我想办法，赚了钱由大家分。”他们还商定，货栈分红，除经理李瑞泉、采购李木生、出纳李玉华，以及幕后指挥者李竞芳等各占一份外，还另有三份“干份”。一份给公社第一把手，一份给农业银行浅水营业所的主任柯栋成，剩下的一份准备赏给“有功人员”。另外，每年给公社上缴五千元。在浅水公社党委某些人的支持和默许下，这家打着公社旗号，实际为私人合股的货栈，就这样于一九八〇年十月领了营业证书开张了。李竞芳当时得意忘形地对同伙说：“大家放手去捞吧，现在正是发财的大好机会。过不了多久，我要在浅水建一幢最漂亮的楼房。”

一九八一年一月，“浅水公社货栈”通过一个投机倒把分子牵线，跟湛江农垦局供销社签订了购买橡胶五十吨的合同，每吨订价六千六百多元。对方提出要先付款后发货。李竞芳便伪造了一张浅水货栈的信汇凭证，从省联行汇兑资金中采取盗用的办法，给农垦局供销社汇出了三十三万三千三百多元。货栈把这批橡胶倒卖到江苏省的一些地方企图牟取暴利，但货被江苏省有关部门查获扣留，暴利没有到手。事后，李竞芳怕自己的罪行败露，又伪造中国农业银行珠海市支

行的票据，汇入相同数额的款项，把这笔巨款从帐本上冲平。

李竞芳一伙经营的货栈，从开始到罪行败露，历时仅四、五个月，就倒卖了一千六百多块走私手表、二百吨化肥、七十一吨多橡胶、三吨大红粉染料。货栈用来进行投机倒把的资金，全是李竞芳从银行营业所贪污盗用的。

李竞芳在一段时间内把国家银行的一个基层营业所几乎变成了他随手可取的私人钱柜，猖狂地进行投机倒把活动，靠的是什么呢？概括起来说就是：“串通公社，勾结银行，打通工商，收买邮电。”

“浅水公社货栈”明明是由私人合伙经营的，但为什么挂的却是公社的招牌？除了议定这个货栈每年交五千元给公社这好处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个货栈的经理李瑞泉是公社主要负责人的小舅子，货栈还背后给这个负责人许愿，将来货栈分红时，有他一份“红利”。

在“勾结银行”方面，浅水营业所的主任、党支部书记柯栋成，就是被李竞芳拉过去的一个关键性人物。这个柯栋成，过去就和李竞芳利用发放贷款的机会受贿四次，共二千四百多元，他分得五百元。浅水公社货栈成立后，李竞芳又许诺将来赚了钱，分一份红利给他这个“有功”的人。他还让李竞芳保管各种单据凭证和公章，给李竞芳作案提供了种种方便。

工商管理部门的某些人，在这一案件中也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他们明明知道货栈是私人合股经营的，也照样发给营业牌照。一九八一年二月，货栈从湖北省套购到一批化肥，准备运回广东高价倒卖。运输途中，被湖南省湘潭县有

关部门查获扣留。工商部门竟然出具证明，谎称这批化肥是公社货栈经营，购回来用于发展农业生产的，要求给予放行。工商部门有的人为什么这样“厚待”货栈呢？原来是因为从货栈得到过二百元钱和一块上海牌手表的劳酬。

李竞芳及其同伙倒卖走私手表时，怕随身携带这些手表到外地去被中途查获，便贿赂邮局的工作人员把手表从邮局托运到外地。从一九八〇年底到一九八一年初，他们倒卖的走私手表达一千六百多块，价值十多万元，其中有五百多块手表，就是通过邮局寄往外地倒卖的。

为了牟取暴利，李竞芳及其同伙一次就托中间人付给湛江农垦局供销社“茶水费”六千多元。这个供销社也很慷慨地卖给浅水公社货栈由国家统购的橡胶五十吨。由于尝到了“甜头”，这个供销社随后又和货栈签订了供给橡胶二百吨的合同。只是由于案情暴露，这笔上百万元的非法交易才没有做成。

一些银行部门管理制度的混乱，也为李竞芳作案创造了条件。李竞芳多次私自动用的省联行汇兑资金，按规定半年要结帐一次，实际上往往一年也不结一次帐。群众曾多次向县农业银行反映李竞芳的问题，但县农业银行的有些人却认为，银行是“铁帐”，是无法贪污的。他们的思想麻痹和对工作的不负责任，已经到了惊人的地步。

现在，李竞芳已被判处死刑，他的同案犯也被分别判处了有期徒刑。这些吞噬人民财产、破坏四化建设的大小“鳄鱼”，终于得到了应有的下场。同样，我们党通过坚持不懈的斗争，也一定能把使这些“鳄鱼”得以生存的歪风扫荡干净。

黄金梦的破灭

金 凤 陈 谦

警惕的眼睛

一九八〇年四月十五日上午九时，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走进人民银行沈阳市分行中华路营业部。她从手提包中取出一块扁方形的金块，递进收购金银的七号窗口。

这时，一个五十多岁的男子，坐在角落里，悄悄注视着。

银行营业员管凤昆接过金块，用手一掂，有三斤多重；一看，金块一边有切割的痕迹。他用试金石验了一下，成色在百分之九十八以上。

有着多年收购金银经验的管凤昆脑中翻腾起来：“这金块成色很高，形状特殊，不象民间所有，却象工业用黄金。哪些工厂可能有呢？十九年前，六一五厂丢过黄金。……”他一面思索，一面凿开金块，继续检验。

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警惕性，促使管凤昆向银行保卫干事刘国臣使了个深有用意的眼色。刘国臣过来看了金块，也觉得不同寻常，马上去给工商局和平区管理所打了电话。

管凤昆用大天平称了金块，重一千八百二十六克多。按每克黄金十三元计算，这金块共值二万三千多元。管凤昆对

那女人说：“你这钱不少呵，在银行储蓄吧。”那女人点点头，然后到八号窗口，分别用六个姓名办了两万三千元的定期储蓄，存了二百元活期储蓄，连同剩下的六十五元多的零钱，一起装进手提包中。那个坐在角落里的中年男子，看到钱已到手，情况正常，悄悄地离开了。

这时，刘国臣来到那个女人身边，劝她到办公室喝口水，休息一下。工商局管理所的管理员夏玉环已经来到，乘机会和她随便聊天：“你带了这么多钱，路上怎么走？要不要银行派人送你回家？”那女人一口回绝：“不用了，我是坐火车从苏家屯来的，市里有亲戚。”夏玉环随口问她亲戚在哪里住，那女人神色有些不大自然，不肯说地址，只说坐十三路车就可以到。

夏玉环觉得这女人形迹可疑，给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区分局打了电话。

迅雷般的打击

九点半，公安局副局长李广军接到电话。十分钟后，他和分局三位同志一起赶到银行。经过询问，那女人说她叫黄淑珍，是沈阳郊区苏家屯公社的社员。

李广军马上和苏家屯派出所联系，回答是没有这个社员。分局同志的态度严厉起来，问黄淑珍：“你为什么撒谎？你究竟住在哪里？”黄淑珍紧张起来，不得不说出她家的真实地址：大东区小河沿路学工里六楼二幢五十四号。

又一个电话打了过去，查明户主叫关庆昌，是六一五厂生产计划科副科长。李广军当机立断，把黄淑珍带回分局。黄淑珍更加紧张，两眼发直，不住地喝水，一口咬定金子是

她爷爷留下来的。

李广军召开紧急会议，果断地决定，立即派人搜查黄淑珍的家里。经过四个小时紧张、仔细的搜查，终于从黄淑珍衣箱底下垫箱子的两个长方形木匣中，搜出九块黄金，加上黄淑珍拿到银行的一块，共八百零七两，正是十九年前六一五厂失窃的全部黄金！

上午在银行角落里观察形势的那个男子，就是关庆昌。他看到二万三千多元顺利存入银行，放下了心，赶回工厂上班。下午四点，关庆昌正在工厂俱乐部参加党员大会。工厂保卫科长叫他到会议室去。关庆昌推开门，只见两位穿民警制服的人。他的脸色变了，但仍然狡辩，说黄金是他爸爸留下来的。

公安分局依法拘留了他。当公安局的同志把搜出的八百零七两黄金摆到桌上时，他额头冒出冷汗，不得不供认十九年前作案的经过。

盗黄金 梦想“变天”

五十四岁的关庆昌，一九四九年到六一五厂当力工，一九六〇年被提拔为计划科副科长，他给人的印象是“老实”、“肯干”、“处事谨慎”、“有业务能力”。然而，这些都是表面现象。解放前他是敌伪工厂的职员，当过蒋军上士文书，长期混迹于破烂市场的生涯，构成了他贪婪、投机、伪善、冒险的内心世界，一遇到适当气候，就发作起来。

六十年代初期，我国在经济上遭到严重困难。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同心同德，向巨大的困难和国内外敌人进行英勇的斗争。这时关庆昌认为“大捞一把”的时机到了。他

和在六一五厂金电解小组当工人的老婆合计：“偷它一批金子，等国民党回来，就可以发一笔大财！”

一九六一年初，黄淑珍在关庆昌的指使下，利用工厂管理不严的空隙，先后从工段偷出金挂钩、金疙瘩和金耳子各一个。关庆昌觉得“不解渴”。他要寻找机会，亲自下手，“偷就偷它个实惠的”。

一九六一年三月十六日下午，他进入成品包装组窥探情况，看到了装有黄金的木箱堆放在地上。作为计划科副科长，他知道当时库房已满，厂领导决定这批成品由包装组直接装车出厂。包装组铁门上锁，难以进去，但隔壁就是压延工段，中间只有一堵木板墙。这两个部门夜间都停产无人，这可是下手的好机会。

三月十七日，关庆昌查阅了生产日报，看不出那批黄金是否入库，又不敢再去包装组，便叫黄淑珍去那里看看，那批黄金还在不在。

三月十八日，星期六。关庆昌下班后急急回家。黄淑珍告诉他：“还在，用苫布蒙着。”

当时，天正下着小雨。关庆昌披上雨衣，带着羊角锤、绳子和手套，进入工厂，先把这些东西藏在办公室里，然后赶到工厂浴池洗澡。洗澡时，他故意和一些熟人大声说说笑笑。

从浴池出来，天已大黑。关庆昌到办公室取了羊角锤和绳子，穿上雨衣，戴上手套，直奔压延工段。撬坏木板间壁，钻进了包装组。他摸到苫布，搬下一个木箱，撬開箱盖，取出两个金锭，用绳子绑在一起，挎在脖子上，掖在裤腰里，外面是棉袄、雨衣。他摸黑出了工厂，赶回家里，把

金锭藏在装刨花的筐底。

几分钟后，他赶到工厂俱乐部参加周末舞会，和工会主席、检查科长等翩翩起舞。散场后，他拉着一些熟人一道回家，边走还边批评一个同志不该和爱人吵架。

三月十九日，星期天，全厂休息。上午，关庆昌理了发。下午，他把金锭藏在做饭用的炉子的落灰膛里。

三月二十日，星期一早晨，包装组工人上班后，发现黄金被盗。失窃的两个金锭重八百零七两，成色在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以上，当时价值十四万一千多元。这起大案件立刻惊动了全厂，震动了全市。

公安人员迅速赶到现场，发现和提取了钉有胶掌的鞋印。这一情况，关庆昌当天就知道了。他晚上回家，立刻把脚穿的钉胶掌的棉鞋底割下来，找出一双没钉掌的单鞋，割下单鞋底，让他老婆连夜绗到了棉鞋帮上，又把割下的棉鞋底和单鞋帮一起塞到炉膛烧掉。第二天，他照常穿着那双已经“留帮换底”的棉鞋上班。

公安人员认定作案工具是羊角锤，关庆昌也很快知道了。他把羊角锤扔到公共厕所里。

专案人员找他谈话，问他星期六下班后的情况。他把进厂洗澡时和谁谈话，到俱乐部和谁跳舞，和谁一起回家，讲得头头是道。他把作案时的“二十分钟”，说成“到理发店理发，走了两家没理上，星期天才去理的发”。显然，这关键性的“二十分钟”没有任何证明，是很大的漏洞。但专案人员看到他新理了发，便信以为真。我们现在看到关庆昌的卷宗上，歪歪斜斜地写着“新提拔的中层干部，无作案因素”。

因此，尽管当时抽调了大批人员，组成了庞大的破案指挥部，但由于工作上的失误，终于使狡猾的犯罪分子关庆昌滑了过去。

“屈死了好人，笑死了贼”

关庆昌确是一个老谋深算的老狐狸。从一九六一年作案以后的这十九年时间里，他一次又一次地躲过了风浪，不但保存了自己，而且骗取了更大的信任。

四清运动中，工厂又掀起破案高潮。开始，他十分惊慌。但是，人们想不到这个一贯表面“工作积极”、善于逢迎上级的狐狸，不久，竟被厂领导调去参加卫生所的查帐工作，随后，又被派去参加市里的四清工作团。一个大盗窃犯，居然成了四清运动的“积极分子”！

“文化大革命”起来了，工厂愈搞愈乱，关庆昌暗暗得意。他沉住气，不参加任何“造反派”组织，玩弄“坐山观虎斗”的手法，整天不声不响地在车间劳动。工厂越乱，他越感到安全，隐藏得更加深了。

清队中，“造反派”宣称：“八百两黄金案，旧公检法破不了，我们来破！”他们怎样“破”呢？老厂长李榆同志，在这一案件发案时因失职受到处分，已调别处工作，这时又被揪了回来，关在黑屋子里，连遭毒打，精神几乎失常。他母亲一九六四年病故。专政队怀疑黄金藏在坟里，竟派人掘了他母亲的坟。他家有位老保姆，一九五九年已回江苏扬州原籍。专政队从电影《羊城暗哨》中得到“启发”，硬说这位老保姆是李榆的“上级特务”，黄金是“特务经费”，不远千里，派人到扬州折磨这位善良的劳动妇女。最先

发现黄金被盗的青年工人小高，耳朵被打聋了；包装组组长郭家志，丢了党籍，妻子吓得得了精神病。连早已退职回乡的工人李春生，也被打得手脚残废。全厂受牵连遭迫害的工人、干部有三十六人之多。更痛心的是，辽宁省一位副省长被说成是“黄金案”的“后台”，夫妻双双被迫自杀！

林彪、“四人帮”一伙掀起的妖风恶浪，正中关庆昌的下怀。“屈死了好人，笑死了贼”，正是这一历史插曲的又一描绘。谁能否认十年内乱，不是乱了我们，保护了关庆昌这样的坏人呢！

绞尽脑汁描绘画皮

关庆昌为了“更保险”，削尖脑袋往党里钻。一九七二年，工厂把他从车间调到财务科当成员。他今天递一份“入党申请”，明天送一份“思想汇报”，处处显示他“紧跟形势”，“工作积极”。每天早晨，不到七点就进工厂，扫地，打水，把科长的桌子擦得溜光净亮，烟灰缸洗得干干净净。科里有同志要请假探亲，科长不同意，他给说情，“自告奋勇承担两个人的工作”。厂里上上下下，都说他是个“好人”。一九七四年，他终于被“纳新”入党，还当了工厂的“先进工作者”。

粉碎“四人帮”后，他摇身一变，又成为“四人帮”的“受害者”。工厂“落实政策”，重新任命他为生产计划科副科长。因为没有科长，他实际上主管全科工作，担任全厂的总调度。一九七七年，他还提了级，长了工资。

受他坑害的李榆同志下放到昭盟，他赶去送行，帮着装车。李榆从十叔回来，他第一个跑去看望。一九八〇年春